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臨床神經解剖學研究  
——過去、現在、未來

服務機關：臺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

姓名職稱：聘用住院醫師陳劭青

派赴國家：土耳其伊斯坦堡

出國期間：105年10月25日至106年12月31日

報告日期：107年01月23日

陳劭青  
住院醫師  
陳劭青 3496A

## 摘要：

在伊斯坦堡進行了一年的神經解剖學研究，完全顛覆過去我對神經解剖學這門學問的狹隘觀點；鑑往知來，更深刻體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少走好多冤枉路。如今學界相當重視論文發表，固然在推進人類知識邊際上多有助益，但若是忽略了「書本」一數千年來始終作為人類知識傳承的重要媒介一則難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於進修期間，我才發現當今神經外科教皇 Prof. Yasargil 對神經外科界所做出的每一項貢獻，其實都站在前人的基礎上，而他個人橫跨數百年、超過兩萬冊的腦科學藏書，正是他助他站上巔峰的翼下之風！

此外我於進修期間亦參訪了北美近十年來皆蟬聯第一名的神外訓練中心，最令我印象深刻有三點：一是名滿天下的訓練中心(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竟是依附於地區小醫院的私人集團、二是這樣小的醫院也有自己的神經外科圖書館、三是集團 CEO(相當於 Chairman)每週至少三天，每次至少 1-2 小時親自與住院醫師討論病例及分享個人經驗，讓我對「傳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臺北榮總走過一甲子的歲月，在前人的努力下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醫學中心；展望未來、邁向百年，如何延續北榮的榮光，於繁花之上再生繁花，我想對知識、技術、及歷史的傳承格外值得關注。

關鍵字：神經、外科、解剖、訓練、傳承、歷史

## 本文：

### 一、目的

神經解剖學知識為神經外科手術之根基，素來為神經外科醫師所重。若論及當代臨床神經解剖學重鎮，神經外科醫師們多半會立刻聯想到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Rhoton 教授的實驗室；但若是提到當代最偉大的神經外科醫師，則全世界所有的神經外科醫師大概無一例外的會一致推崇 94 歲高齡仍於伊斯坦堡執教的 Yasargil 教授！這兩位教授的傳承與理念雖不盡相同，卻共同影響了至少三代的神經外科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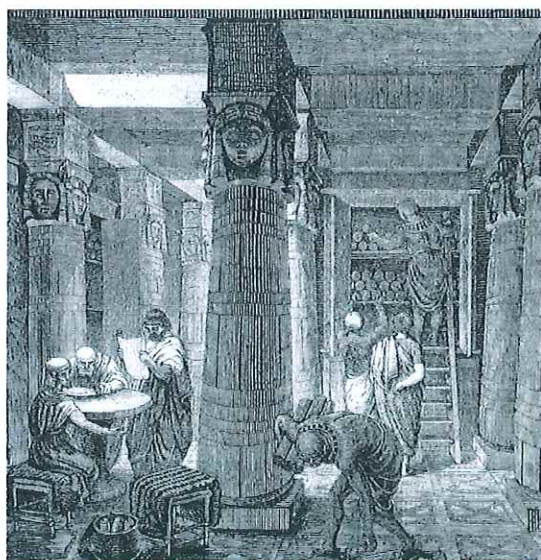
我於住院醫師期間有幸受教於 Yasargil 教授的學生，並與 Rhoton 教授的學生多所接觸，即已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幸運；然而即使如此，兩位教授的學生皆一致推薦我還是應該趁著 Yasargil 教授仍在世，到伊斯坦堡親炙其大師風範。經過一年在伊斯坦堡的學習，我終於深刻體會顏淵當年的心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雖然一年的時間太短，絕不足以盡窺亞氏學說之堂奧，但回想進修前對神經解剖學的觀點之狹隘，雖深感慚愧，亦自覺一年來進境不少；比起當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至少我已略知 Yasargil 學派千年傳承之脈絡，知道將往何處尋寶。以下將略述此一傳承之源起、今日發展，以及未來展望，更重要的是從 Yasargil 教授一生的傳奇經歷中，尋找在此瞬息萬變的資訊爆炸時代，一個能幫助臺北榮總神經外科安身立命、繼往開來的啟發。

## 二、 過程

一般公認西方醫學之父為活躍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0 B.C.)，然而事實上希波克拉底並無留下手稿、行醫紀錄、或是直接受業於他的學生；但在公元前三世紀建立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內(Library of Alexandria)，有一個編目囊括了許多關於醫學的文獻，稱之為「希波克拉底輯錄」(Corpus Hippocrates)；因此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皆把希波克拉底輯錄視為希波克拉底的直接貢獻，並把亞歷山大圖書館此一傳承視為希波克拉底醫學院！

繼承亞歷山大大帝埃及領土的托勒密王朝，仿照亞里斯多德雅典學院為樣板，透過重金收購、掠奪、抄寫等手段，在亞歷山大城建立了當時世界上藏書最多、書目最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並同時設立數學、醫學、文學、天文學四個學院，廣邀國際知名學者主持。在王室的支持下，亞歷山大城很快成為國際文化中心，人文薈萃、所有知名的國際學者皆集中至此處講學、授課、並進行研究。



*The 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 O. Von Corven, 19th centu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of\\_Alexandr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of_Alexandria)

亞歷山大鼎盛時期最富盛名的醫師—希羅菲盧斯 (Hirophilus) 出生於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亞州岸卡迪柯伊 (Kadikoy)，是公認的第一位神經解剖學家，據說當時各國的貴族政要若患疾病，皆不遠千里至亞歷山大城向他求診。他藉由解剖學研究，發現所有的神經皆可追溯至腦，因而提出人類意識源自於腦，而非亞里斯多德以前的哲學家所主張的心源說，他也是第一位描述不同腦室構造的醫師，他認為人類的靈魂就居住在四腦室下半部。西方醫學因為解剖學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在這個時期有長足的進步。

而若要談及西方醫學史上近兩千年來最具影響力的醫師，則非蓋倫 (Galen) 莫屬；在他之後約有近 1500 年的時間，沒有超越蓋倫時代的醫學論述出現，直到 16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以後，西方世界才對人體再次的感興趣，將注意力從「神」轉移到「人」身上。蓋倫出生於西元二世紀羅馬帝國的 Pergamon，是今天土耳其小亞細亞距愛琴海約 26 公里的帕加馬 (Bergama)，他曾於年輕時至亞歷山大進修約 10 年，並終身將自己視為希波克拉底及希羅菲盧斯學派的繼承者。在他「論解剖」(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一文中曾留下他對進修的看法：

*請慎重考慮別只是從書本上學習解剖學知識，請試著親自仔細的檢視一切解剖構造……要做到這些在亞歷山大並不困難……因此，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請試著到亞歷山大城去。*

結束亞歷山大城的學業之後，蓋倫首先回到家鄉去，成為羅馬角鬥士 (Gladiator) 的治療師；他驚人的療效很快引起注意，並將他帶至羅馬且成為御醫。然而，終其一生，因為羅馬帝國的禁令，蓋倫不再有機會進行人體解剖，而必須使用猿猴或是公牛作為替代品，這也成為 1400 年後，他飽受維薩里 (Andre Vesalius) 詬病的主因。



Andre Vesalius &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as\\_Vesalius](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as_Vesalius)

西方醫學再次有重大突破得等到 16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當維薩里再次對人體進行解剖。儘管維薩里對蓋倫的每一項解剖發現做更深入的描述時常不忘批評蓋倫及其學生滿足於利用動物解剖研究標本、或者因為忽略某些細節而沒能做出更正確的論述，但無疑維薩里是蓋倫的頭號粉絲。不僅他將許多蓋倫的手稿從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他自己的書「人體的構成」(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寫作形式模仿蓋倫的著作、更在書中稱呼蓋倫為「神聖的蓋倫」！下面這段書中的描述更能看出他對蓋倫的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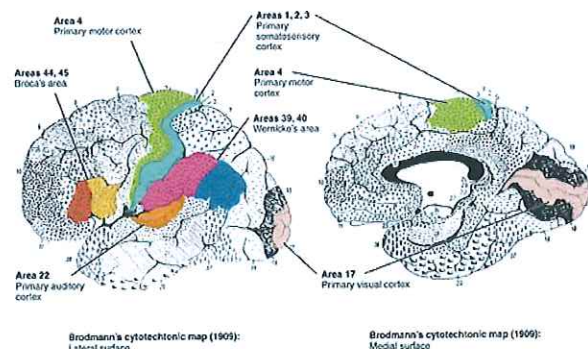
*在許多義大利大學，有些人傲慢地將(穹窿體)視為大腦蚓部，並因此宣稱自己有了重大發現。在此我必須限制我自己繼續談及這些無能的解剖學家：他們不僅是徹底的無知而且他們所宣稱的重大發現不僅毫不重要還對醫學一點貢獻也沒有。更有甚者，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證明的錯誤的、瑣碎的知識，事實上早已被蓋倫優雅並準確的描述了。*

然而即使是偉大的維薩里也沒能夠回答千年前蓋倫的疑問：穹窿體(Fornix) 究竟源自哪裡？又終於何處？但是維薩里的學生做到了。法洛里(Costanzo Varolio) 一改千年來皆把腦留在顱骨內檢視的傳統，首先將腦拿到顱骨外，由下往上檢視，不僅找到了穹窿體的起源—海馬迴，更重要的是這個步驟開了解剖學新的篇章！醫學的突破往往伴隨著新技術的採用，在此基礎上法洛里第一次準確的描述了橋腦(Pons)，也因為同樣的技術，英國醫師威利斯(Thomas Willis)才注意到顱底的大腦動脈環(Circle of Willis)，並將環繞腦幹周圍的腦迴稱為「邊緣」(Limbus)，當時他大概沒想過近三百年後對「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 的猜想會成為人類對腦功能研究的濫觴。

十七世紀初出現了另一個技術性的突破，即對標本處理方式的改善。義大利解剖學家馬爾皮吉(Marcello Malpighi) 率先將腦放入沸水中煮熟，從而延長了標本保存時間；另一位法國醫生維尤斯(Raymond Vieussens) 改進了他的作法，將腦放入油中煮，因此更好的保存了神經纖維束，並出版了第一本神經纖維束的圖譜。從此時開始直到二十世紀中，約有三百年的時間，從事腦神經纖維解剖一直是研究巨觀腦解剖的主流方式，也因為此一技術，十八世紀的達吉爾(Felix Vicq D' azyr) 在法洛里找到穹窿體起源的兩百年後，終於能答出蓋倫千年一問的另一半答案：穹窿體的終點在乳頭體(Mammillary Body)。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後，有將近五十年的時間，少有人再進行神經纖維束的解剖研究，直到二十一世紀腦磁共振造影技術(MRI)中擴散張量影像(DTI)的發展，才再次勾起了人們對尋找神經纖維束的關注。

十九世紀是神經解剖學大放異彩的時刻。經過兩千年對腦部「結構」的研究，人類直至今時才終於有足夠的基礎開始探問如今令無數腦科學家著迷的問題：如何分辨腦部不同的功能區，他們彼此之間又如何協同運作？關於腦功能的猜想一樣始於穹窿體。兩千年來，西方解剖學家們一直認為穹窿體是上帝極偉大的創造，他就像屋子的橫梁一樣，不僅構成了三腦室頂，也撐起了側腦室，而腦室內流淌的、清澈的腦脊液即是人類意識的泉源；相比之下，佔據顱內極大空間的腦實質，則並未受到太多關注。直到十九世紀初，才開始有解剖學家懷疑與海馬迴相連的穹窿體，該不會跟人類記憶也有關吧？而對穹窿體的研究，儘管許多解剖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且終被證明是錯誤的，如 Papez Circuit、Jacob Circuit，但在這些基礎上我們終於逐漸掌握了人類對於記憶、慾望、情緒控管極基礎的知識——邊緣系統的存在。

十九世紀另一個腦解剖學發展的重要分支是腦皮層細胞結構學 (Cytoarchitecture)，始於梅涅特 (Meynert) 率先將腦皮層拿至顯微鏡下觀察，發現原來並非整個腦的皮層細胞排列方式都相同，而是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布羅德曼 (Brodmann) 以相同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根據細胞結構並整合腦功能區，將大腦劃分為一系列解剖區域的布羅德曼分區 (Brodmann Area)。此種技術受到許多解剖學家的重視並持續改良，於二十世紀中葉前一直是研究腦功能分區及顯微解剖學的重要工具，然而隨著神經刺激術的發展及其對腦功能分區研究的影響，細胞結構學的研究也逐漸淡出臨床醫師的視角，不再受到太多重視，直到二十一世紀，當 3T MRI 的解析力提高，解剖學家能用磁振造影進行皮層結構區塊分析，細胞結構學的知識才又再次受到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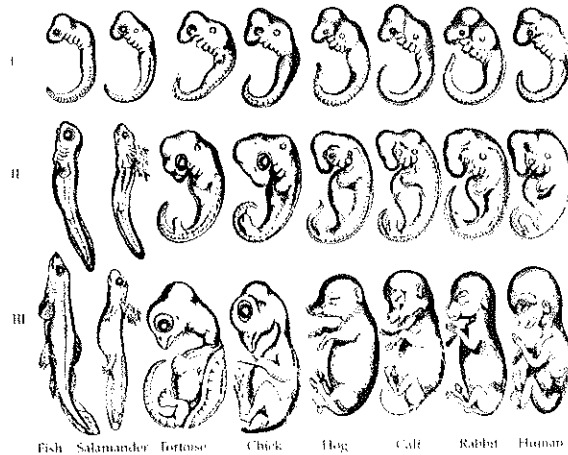


*Brodman Ar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odman\\_area](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odman_area)

談到十九世紀的科學發展，另一個不能不談的學說即是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所提出的演化論。即使從一開始便飽受教會的攻擊，然而還是不能阻止科學家們去探索、驗證達爾文學說的好奇心，並因此衍生了幾個不同的學門；其中，比較解剖學這門學問對神經解剖領域起了非常深遠的影響。藉由

觀察不同物種的胚胎發育過程及其系統發生學上的演化距離、重演論的研究，解剖學家對於腦部構造的理解不再止於發育完成的成人腦部狀態，而是涵蓋了人類腦部演化、胚胎發育的歷史，對於各項疾病可能的起源、可能的存在方式，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註)



*George Romanes's 1892 copy of Ernst Haeckel's controversial embryo drawing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capitulation\\_theo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capitulation_theory)

甚至，因為遺傳學、細胞學、分子生物學一日千里的進展，如今的神經解剖學已經進展到基因的層次—連達爾文大概也未曾想像過，即使是與我們看來差異如此巨大、在演化樹上親緣關係極遠的果蠅，一樣透過幾個類似的基因來調控體節；而人類的體節，即是不同的脊椎節數。

人類的醫學技術在近百年內取得極大的進展，神經外科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學門—專科化約莫只有百來年的歷史—其日新月異的突破自是令人時刻感到興奮，特別是近三十年來電腦斷層及磁共振影術的發展，更大大開拓了神經外科醫師的眼界，全方面的提升了神經外科手術治療疾病的各種可能性。當我們沉醉於新科技所帶來的新知識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前人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若是深入檢視過去科學家們窮盡畢生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很容易便能找到與今日最新科學發展之間的連結，並獲得不同的啟發。畢竟所有重大的科學發展，無一不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一步一步向前；相信即使是神聖的蓋倫、抑或偉大的維薩里，也會支持此一觀點。

註：於 1870 年由海克爾 (Ernst Haeckel) 提出的重演論認為不同物種在同一段發育時期的差異也會顯現出這些物種在演化上的親近程度，而且這些生物演化歷史的重複表現，能夠出現在任何生物的胚胎發育過程。此學說已於 1997 年被正式推翻，因其雖然經常發生，但並非是一個自然規律。

### 三、心得

1917年，著名的義大利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提出了一個後來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命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朱光潛的《克羅齊的歷史學》一文曾對克羅齊的這一命題做了如下闡發：「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甦，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

亞歷山大圖書館成立時的目的即是要成為國際性的希臘研究中心，雖然他並非建在希臘本土，而是在埃及，但憑藉著托勒密王朝的重視(資金及設備)、優越的地理位置(地中海希臘化世界及東方世界的貿易要衝)、交由國際知名學者主持並廣納各國優秀人才，組織起來用於學術研究(管理)，因而締造了亞歷山大圖書館長達數世紀的輝煌，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學院之一！檢視亞歷山大經驗，我們甚至不難發現今日辦學或從事研究最受重視的特點：自由的學風。在希臘文化中，人體解剖是道德上的絕對禁忌，然而儘管受到同時代某些人的大力抨擊，希羅菲盧斯在亞歷山大城的解剖學授課仍能持續進行，不僅三百年後離開亞歷山大城的蓋倫做不到、一千八百年後的維薩里進行得很艱辛，即使今天在許多國家也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但人類藉由解剖學所習得的知識，對於醫療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幾乎是一切西方醫學的基礎。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另一個貢獻是將知識的創造與傳播，轉變為國際性的。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建成之前，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區性的，但是有了這第一座國際圖書館之後，知識的傳遞變成國際性的交流；而且亞歷山大圖書館並不只有收藏希臘世界的著作，而是廣泛性的收集所有能夠取得的文獻，包括波斯、埃及、甚至中東、印度等，並將其翻譯成希臘文收藏。這個傳統為阿拉伯世界所繼承，因此即使在亞歷山大圖書館滅亡千年之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者，仍能再次將已經被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希臘典籍，重新翻譯為拉丁文並彌補文化斷層。今天在台灣醫界，醫學教育的英文化是我們的一大優勢，少了語言的隔閡，大部分的醫師皆能與當前西方醫學主流、北美的醫療文化無縫接軌；然而，在此同時，我們是否也忽略了自成體系的歐陸、日本、甚至南美及中東國家對醫學所做出的貢獻呢？

此次進修對我的一大改變是讓我重拾對「書籍」的關注。在醫學院裡，常常能聽到老師說，應該要多讀最新的醫學期刊，因為所有寫到教科書裡面的知識，往往都已經是過時的知識；誠然這個觀點大抵不錯，但現在我也有了新的體悟：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即使今天閱讀期刊才獲得的知識，明天也可能



立刻變成一文不名的垃圾。「論文發表」其實並不是新的時尚，早在亞歷山大時代就存在了，但留存至今的還有另一個傳統：真正的學術巨擘除了發表論文，還會費一點時間，把自己畢生的研究心得，寫成幾本學術巨著；而真正流傳下來的，往往是這些書，不是單篇論文，畢竟「書籍」還是人類千百年來傳承知識的主流媒介。另一方面，論文發表的往往是某一個時刻某人對某件事的看法，然而當那位學者經過人生的歷練，及其後更進一步的研究，觀點也許早已改變，抑或又有了新的領悟。經過時間的淘洗，真正能流傳到今天的巨作，儘管有些觀念可能已需要修正，但絕對有其價值存在。

知識除了向書籍裡求取，如果遇到一位能傳道、授業、解惑的名師，透過他的眼睛，能看到未曾想像過的風景，那自然更是幸運。前面提到 19 世紀下半葉，神經解剖學取得了許多重大的進展，也開闢了很多不同的學門，遺憾的是，雖然經過的時間並不長，但這些前人們取得的巨大成就幾乎已經被今天的臨床醫師們所遺忘，或者說，毫不在意；要一直等到近幾年腦磁共振造影技術有了新的進展，今天的醫師及學者們，才又再次發現了其實早為 19 世紀科學家們所熟悉的一些事實。

其中一個例外即是 Prof. Yasargil，他出生於 1925 年，當他讀醫學院的時候正是這些上個世紀的學說逐一達到巔峰的時候。因為對腦科學的著迷，他個人收藏了超過兩萬冊的腦科學相關書籍，即使隨著年紀的增長，他也未曾有須臾失去對腦科學各領域的關注，儘管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的醫生來了又離開，他仍一直堅守在手術台上，直到 87 歲還依然在做手術。隨著臨床經驗的增加以及大量的閱讀，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從千年來蛇杖傳人們的身上，萃取出知識的精華，應用在今日神經外科手術的臨床醫療；透過他的眼睛，傳承變得如此清晰，所有零碎的知識都有了脈絡可循！

我曾於進修期間短期參訪 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是目前北美手術量的最大的神經醫學中心，年手術量約六千台、也是蟬聯近十年北美排名第一的訓練中心。然而令我驚訝的是，原來聞名世界的 Barrow 神經醫學中心，竟然不是大學附設醫院，而是私人醫療集團，並且是依附在一家規模並不大的連鎖區域醫院 St Joseph Hospital 之下。Barrow 集團向 St Joseph Hospital 租用手術室及門診區，財務獨立，不僅分開經營，連門診區與手術室都跟 St Joseph Hospital 的其他部門分開，讓 Barrow 神經醫學中心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地聘請適任的醫師。而儘管每年能訓練全美最多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四名)，主治醫師卻不一定是在 Barrow 受訓的住院醫師，反而往往是外聘的專家，以保證 Barrow 能持續有新的文化、新的基因加入！

然而，Barrow 真正令我感到驚訝的卻不是他們真有多麼高超的手術技巧，而是 Barrow 的訓練制度。儘管只是訪問學者，所有人報到的第一天便會被帶到

圖書館去，授予使用圖書館的各項權限，並且能不受限制、免費的翻印圖書館的館藏。最令我訝異的是，一週有三天，Barrow 神經醫學中心的大老闆，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神經外科醫師之一，Prof. Lawton，都會親自花上至少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與所有的醫學生、住院醫師、臨床研究員、及訪問學者們，詳細的檢討每個手術病患的治療策略，以及他個人對此種治療方式的看法。當然，他也不會忘記詢問年輕的住院醫師們，最近的新文獻是不是有提出什麼新的治療方式或值得一提的新建議，然後再給出他的點評。

到過 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讓我對「傳承」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Barrow 能夠蟬聯北美訓練中心之冠，果然是實至名歸。當所有的 trainee 都能夠從小跟隨著名師學習，而且名師能夠將自己一以北美標準確實堪稱千金難買一的寶貴的時間，不吝嗇的與學生們分享，自然能夠穩定地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非常傑出的神經外科新血。

進修期間，我也曾短期參訪另外一個神外重鎮，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天壇神外無庸置疑是當今全世界神經外科手術量最大的神外中心，每年執行近一萬五千台腦部手術，光是神外手術室就有 21 間。中國的人口基數大，醫療品質又良莠不齊，也因此病患多往大都市集中，造成其他醫院的罕見、困難病例，在天壇醫院卻往往成為常規手術。另外在國際上，通常每個知名的醫療中心都是以專精於某項疾病之治療而聞名，但在天壇醫院，則是幾乎每一類疾病都有一個只專注於此領域的 super specialized specialist。

也因此，天壇醫院神經外科醫師們對於手術的熟練度、以及手術能力的平均水準，確實是我平生僅見。但真正令我訝異的是，許多年紀超過六十歲的科主任、副院長等，依然在手術室第一線奮戰，仍親自執行大量的手術，甚至在手術結束後親自止血，並指導後進。即使是在中國地位極崇高，被尊稱為「亞洲第一刀」的張俊廷教授，查完房偶爾也會花上近一小時的時間，叮囑年輕學生們許多手術最枝微末節的小細節，並勉勵學生們，惟有徹底關注這些毫不惹人注意的小細節，才有可能真正把手術作好。我相信這種精益求精的天壇精神，正是天壇神外成立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便超越中國其他更具歷史的醫療院所，廣獲中國人民肯定的原因！

#### 四、 建議事項

西方醫學的基礎立足於解剖學，尤其是對外科醫師來說，再怎麼強調解剖學知識都不為過！然而，誠如近兩千年前蓋倫所言，解剖學不能僅從書本上學習，而是必須親自用眼睛去檢視、用手去觸摸每一個解剖構造，才能將細節印在腦海中。臺北榮總神經外科已有成立約十年的顱底解剖實驗室，但器械多是

成立當時由手術室淘汰下來的老舊器械，目前已不堪使用；另一方面實驗室的標本來源亦是青黃不接，目前多使用每年各項解剖研習營後，學員們使用過的剩餘標本，品質自然難以維持。

① 要讓顛底解剖實驗室能運作得更順利，關鍵自然不外乎設備更新與人員管理。在設備及標本方面，如果每年能有固定的預算購置器械以及標本，而不是四處尋找淘汰掉的、或是用剩待拋棄的東西，自然較能保障品質；另一方面，本科其實早有許多對解剖學有專精的主治醫師，亦可從現有的人力裡面成立任務編組，專責管理、更重要的是專責教學，指導住院醫師及總醫師們進行解剖研究，甚至將研究解果整理發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動手進行解剖學研究前，廣泛地閱讀、深入探討前人的心得是必要的。猶記擔任資淺住院醫師時，科裡曾要求每個住院醫師對 Rhoton 教授的解剖學著作分不同章節做讀書會及心得報告，但曾幾何時這個傳統漸漸的就消失了，只剩下 Journal Reading 的活動，由住院醫師們介紹一些醫學新知。我認為，期刊著作雖具有即時性，能最好的傳遞醫學新知，但是書本則比較能傳遞系統化的知識，使讀者不至於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兩者不應偏廢。

如今因為網路的發達，及各項資訊工具一日千里的進展，每個住院醫師都能及時取得最新發表的論文，閱讀並學習，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於此同時卻也似乎漸漸失去了對教科書的重視，一旦養成習慣，遇到問題時容易滿足於「最新、最炫、剛發表」的研究結論。但事實上，醫學的進步往往不是直線發展，而是反覆震盪，透過多種不同觀點相互詰辯，我們才漸漸的往真理邁進了小小一步。我認為，不僅應該向年輕醫師們強調教科書的價值、提倡閱讀教科書，甚至應該要再次的將傳承下來的經典文獻拿來與今天的文本做比較，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代又一代的宗師們，是怎麼思考這些問題、他們得到哪些結論？怎麼得出這些結論？又為什麼後來的人有了不同的想法？鑑往可以知來，否則沒有歷史深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學識，就像空中樓閣，容易令人處於一種時時憂心今是而昨非的焦慮之中。

② 最後，也是對外科醫師最重要的，還是師徒之間的傳承。一個年輕的住院醫師、或甚至年輕主治醫師，受限於人生的經歷，儘管有著滿腔學習的熱誠，卻常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學、該怎麼去學；而一個宗師剛好能為門徒指出這條路！特別是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所有的知識皆唾手可得，但如何從中淘選出真正有價值的訊息、投資時間精力去深研而後習得智慧卻變得更加困難；我認為，借重有經驗的師長們的洞察力，來為年輕學子指路，是一條捷徑！

在台灣醫界，也許繼承華人文化「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專業領域卓然有成的名醫往往還肩負責任重大的行政職位，臨床、研究、行政蠟燭多頭燒，非

3  
★

常辛苦；若還得同時兼顧教學，則難免左支而右絀。但我自己身為一個年輕醫師，即使常自覺幸運的、有很多師長指點迷津，仍覺得學海無涯、走得跌跌撞撞；因此更能深切感受到若沒有師長的指導，以自己有限的經歷及狹隘的視界，在學習的路上大概寸步難行。所以即使深知師長們為了病患及榮總幾乎都已奉獻一切，我還是想貪婪地再向各位老師多要一點時間，期盼他們能在科內設立一個講座，由科室主任們常規地、系統性地將畢生絕學傳授給年輕醫師，與學生們互動式的討論；與當前大部分由年輕醫師報告、老師們點評的會議雙軌並行，應該有助於開拓年輕醫師的視野、縮短成熟的時間。

輝煌的歷史奠基於文化的傳承，只有時間能淬煉出真正具有價值的學術發現。論文發表在今天評價一位醫師非常重要的指標，同時也希望老師們教學的時候，不忘鼓勵年輕醫師們在努力進行研究、讀論文、寫論文之外，也能多讀讀「書」。對於學有專精的老師，如果能花點時間將自己的經驗系統性的寫成一本專著，而不只是參與教科書裡某些章節的撰寫，相信更能將自己獨到的見解與體會，更完整的傳承下去。

另一方面，盡信書不如無書，如果只是讀萬卷書，恐怕還是不見得能掌握醫治病患的訣竅；一個好老師的人生經歷，是真正無價的寶藏。希望有經驗的老師們，儘管公務繁忙，仍能試著抽身與學生們深研每一個病例，常規地、系統性的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相信這也是榮總邁向百年榮光計畫裡非常重要的一環——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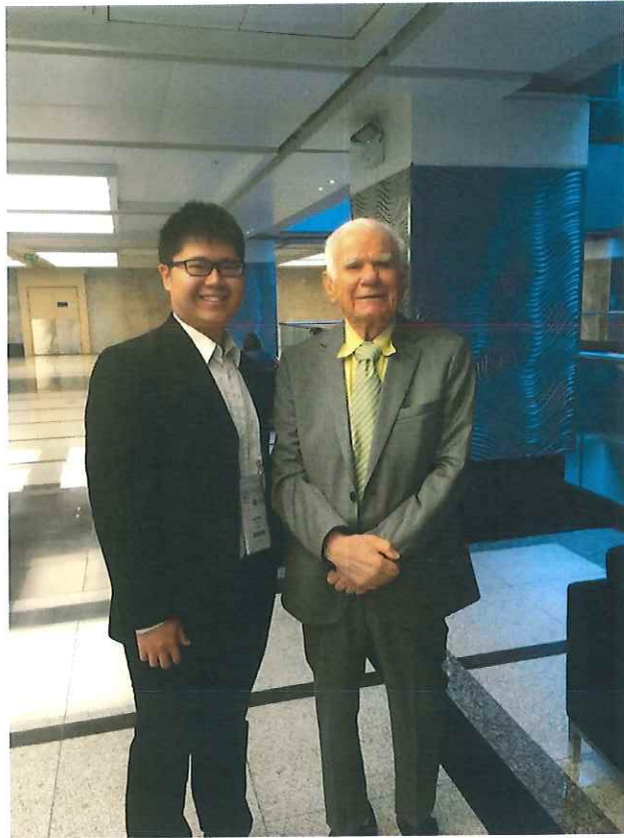
##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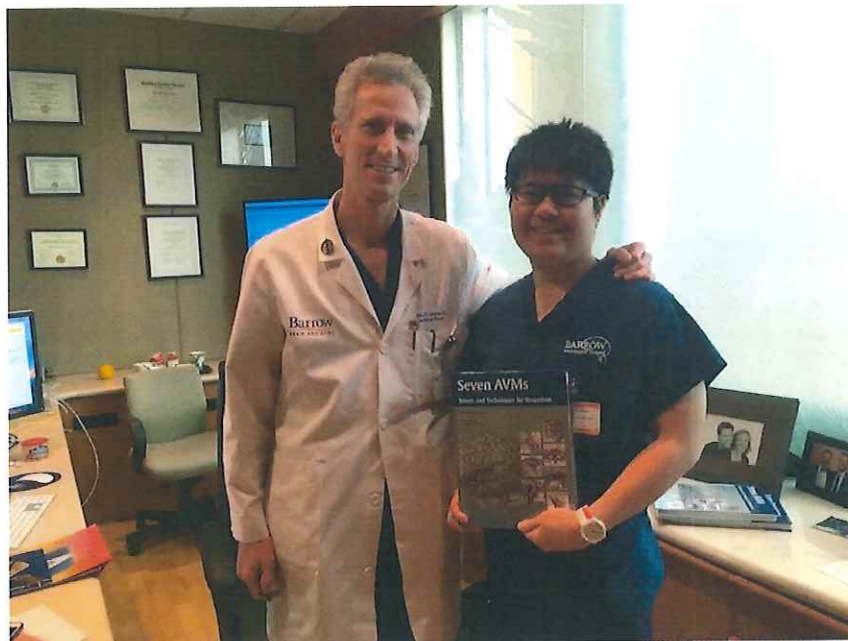
伊斯坦堡葉迪特佩(Yeditepe)大學附設醫院



與至伊斯坦堡短期參訪的高雄長庚莊銘榮醫師於實驗室合影



與高齡 92 的神外教皇 Prof. Yasargil 合影



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 CEO Lawton 教授贈我他的簽名書



Lawton 教授每週皆有三天親自與所有的學生、住院醫師、訪問學者等討論臨床案例



天壇醫院張俊廷教授查房後與整個團隊繼續討論臨床案例



我於天壇神外七病區晨會講述顛底解剖構造